

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实践探索、经验总结与当代价值研究

王 静¹, 王志章^{1,2}, 杨志红³

(1.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重庆 400715;

2. 西南大学 “一带一路”反贫困研究中心, 重庆 400715;

3.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 中国共产党反贫困取得伟大成就的经验在于坚持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放在首位, 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制度优势, 坚持构建多元主体的大扶贫格局, 坚持创新中国化的扶贫方式, 坚持开放共享、注重国际合作。中国减贫直接推动了全球减贫进程, 与世界分享中国扶贫经验对推动世界减贫事业、合作开展反贫困, 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反贫困; 实践探索; 经验总结; 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F3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566(2022)05-0057-09

Study 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ti-poverty Practice, Experience and Contemporary Value

WANG Jing¹, WANG Zhizhang^{1,2}, YANG Zhihong³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Beibei 400715, China;

2. Southwest University's "one belt, one road" Anti-Poverty Research Centre, Beibei 400715,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Shaanxi 710127, China)

Abstract: The experi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ving great achievements in anti-poverty is to insist on putting happines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first place, insist on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system, insis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arge-scale poverty alleviation pattern with multiple subjects, insist on the innovation of Chinese poverty alleviation methods, and insist on openness, sharing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has directly promoted the global poverty reduction process, and sharing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experience with the world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world poverty reduction and cooperation in anti-poverty.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ti-poverty; practical exploration; experience summary; contemporary value

收稿日期: 2021-02-10 修回日期: 2022-01-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大调查与贫困陷阱跨越策略研究”(18ZDA121);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部地区易地搬迁后续扶持的多元化路径设计与政策协同研究”(21ASH005); 贵州省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重大专项课题“贵州省易返贫人口常态化监测、精准帮扶长效机制研究”(21GZZB06); 重庆市教委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理论研究阐释专项课题重大项目“重庆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及对策研究”(19SKZDZX14)。

作者简介: 王静(1992—), 女, 重庆人, 西南大学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减贫与发展。通信作者: 王志章。

贫困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消除贫困是联合国《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既定目标。新中国成立伊始,面临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窘迫现实,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奠定了大规模反贫困的制度保障和经济基础,“站起来”的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新时期,励精图治,极大提高了我国综合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实现了“富起来”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团结各族人民乘势而上,取得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兑现了党中央向人民做出的到 2020 年底彻底告别持续千百年绝对贫困的庄严承诺,提前 10 年完成了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类奇迹,中华民族“强起来”迈出坚实步伐。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反贫困的实践探索,总结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反贫困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经验,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继续与相对贫困做斗争,续写“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新篇章,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更多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实践探索:不忘初心的一部奋斗史

中国共产党反贫困不懈奋斗的峥嵘岁月就是一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艰苦奋斗史。为便于总结,本文依据新中国史将领导反贫困的实践探索历程划分为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至新时代和新时代以来 3 个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构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制度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群众普遍处于极端贫困状态。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1],为经济复苏和

反贫困奠定了前期基础^[2]。一是从法律层面着手,为解决中国贫困问题提供遵循依据。1949 年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界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5 种经济成分并存,且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3]。1953—1956 年,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反贫困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是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走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之路。1955 年,毛泽东同志指出要以合作互助的方式替代小农生产模式,避免农村出现只有少数人发财的局面^[4]。1956 年,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解放生产力的根本就是要让全国农民摆脱赤贫状态^[5]。同年 12 月发布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明确要求“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6]。三是不断推进农村改革,为反贫困创造条件。1950 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所有,实现耕者有其田,农村土地占有不均的现象基本得以解决。同时,将粮食生产排在第一位^[7],尽管这期间粮食生产遭遇到“大跃进”等的冲击,但总体保持了增长趋势。

(二)改革开放开启历史新时期:经济持续增长为反贫困奠定坚实物质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扶贫开发事业进入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新阶段,反贫困能力不断增强。一是实行和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农村生产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了农民的家庭主体地位和权利,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创造性和积极性,农村经济快速增长。按照 1978 年的贫困标准,1985 年贫困人口从 1978 年的 2.5 亿人减少到 1.25 亿人,贫困发生率从 30.7% 下降到 14.8%,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增长 169%,年均增长率高达 15.1%^[8]。仅用了 7 年时间,农村贫困发生率减少一半^[9]。二是以贫困县为扶贫对象,开展瞄准式扶贫。1986

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推动了减贫工作有序化、规范化^[10],1986—1994年间,党中央通过设置国家级、省级重点扶持贫困县,开启了瞄准式扶贫模式,贫困人口从1986年的1.25亿人减少到1994年的8000万人,贫困发生率也从14.8%降到7.8%^[11]。三是注重区域非均衡格局,建立了东部沿海省份对口帮助西部贫困省份的协作模式。到2000年年底,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3000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左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基本解决^[12]。四是实施整村推进,开展深化式扶贫。《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明确将扶贫对象瞄准到贫困村,2001年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14.8万个贫困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又明确14个连片特困地区共计689个县为扶贫攻坚主战场,更加注重区域内的贫困问题。按照2010年2300元不变价的贫困标准,2012年的贫困人口为9899万人,贫困发生率为10.2%^[13]。

(三)新时代扶贫战略转变:精准施策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

党的十八大全面开启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扶贫开发摆到了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一是更加聚焦贫困人口,实施精准扶贫新方略。针对“年年扶贫年年贫”的现状,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重要论述,要求“找准‘穷根’、明确靶向、量身定做、对症下药”,对贫困户逐一建档立卡。同时,按照“六个精准”的要求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二是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靶向发力。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为贫困人口量身制定了“五个一批”的脱贫路径,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教育扶持脱贫一批、政策兜底一批。三是全力攻坚深度贫困,同步建成小康。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作出支持“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战略部署,指出“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是“坚中之坚”“难啃的硬骨头”,需要采取更加集中、更加有

力、更加有效的办法推进反贫困进程。同年11月,印发了《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明确新增的项目和资金等资源主要用于“三区三州”地区,以及贫困发生率18%以上的贫困县和贫困发生率20%以上的贫困村。截至2020年11月,全国贫困县全部摘帽,“一个人不掉队,一个民族不能少”,与全国人民同步建成小康社会成为现实,中国共产党追求“共同富裕”的核心价值和初心在反贫困的斗争中一一呈现。

二、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经验总结:不断探索创新的智慧结晶

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坚持人民至上,牢记初心使命,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放在首位,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共同富裕”再到“共享发展”,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智慧结晶。

(一)坚持初心使命,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放在首位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品格,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共同富裕”“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还是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将“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初心使命,始终一以贯之、一脉相承,把人民的幸福放在首位,与贫困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

1. 推动民族复兴,把提高民生福祉作为根本出发点。新中国成立尤其是三大改造完成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展开了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探索,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人民生活状况有所改善。改革开放后,无论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消灭贫困的“三步走”步骤^[14],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15],还是胡锦涛同志提出用发展的眼光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始终把发展放在首位,人民才有了“富起来”的保证。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到脱贫攻坚再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少数民族一个不能少、一

个不能掉队”,念念不忘人民,国家有了“强起来”的根基。

2. 创新举措营造良好环境,为贫困群众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一是着力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到相对发达的省份和地区务工就业,提高工资性收入比例,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二是取消实施了 2000 多年的农业税、推广普及农业科技创新、设置农业补贴、实施支农惠农强农政策、颁布“四项补贴”等鼓励农业规模经营,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增加农业收入。三是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将教育、医疗、交通、通讯、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向贫困人口集中的中西部地区倾斜。四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筑牢返贫防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要求“把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相互促进”,以此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二)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立足国情充分发挥制度优势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善于把握历史脉络,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积极探索反贫困路径^[16],充分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独有的优越性。

1. 坚持党总揽反贫困大局,紧扣目标持续推进。一是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完成土地改革,提高了广大工农的积极性,增加了人民收入。二是坚持把消除贫困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作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的著名论断。三是坚持把消除贫困视为践行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具体行动。江泽民同志指出要把扶贫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一切为了群

众,形成了“新三步走”战略目标。四是坚持把消除贫困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根本体现。胡锦涛同志提出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在 2020 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消除贫困的宏伟目标。五是坚持把消除贫困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底线目标。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要求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政策倾斜,坚决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并以此为新的起点,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筑牢返贫防线。

2. 发挥制度优势,不断调适扶贫战略。一是从不含有具体目标的涓滴式减贫转向目标瞄准式减贫。1986 年前,我国减贫主要依靠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既没具体的扶贫对象,也没系统的扶贫措施,直到 1986 年党中央成立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反贫困工作才有了统一的领导。二是从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坚持保障式扶贫与开发式扶贫相结合。针对以往临时性、应急性的扶贫救济政策存在的弊端,2007 年开始,国家采取保障式扶贫与开发式扶贫相结合的战略,设置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是根据扶贫目标适时调整扶贫对象。先是在中西部确定 592 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并将贫困瞄准重心下移,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 14.8 万个贫困村;之后,又将扶贫对象转向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更加注重区域内的贫困问题。四是更加注重精准,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识别和精准施策。2013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一系列重要论述,改变了以往“大水漫灌”式的传统扶贫方式,实现了从“漫灌”到“滴灌”。

(三)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凝聚力量构建大扶贫格局

政府主导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扶贫开发工作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贫困治理效能的充分体现。实践证明,发挥政府在扶贫中的主导作用、坚持贫困人口的主体地位、汇聚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内源式”的扶贫大格局,才能真正

实现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

1. 坚持发挥政府在扶贫中的主导作用。首先,建立统一领导机构,优化工作机制。党中央成立专门负责的扶贫开发部门统一制定扶贫开发计划,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成立了扶贫开发机构,形成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并建立了五级书记抓扶贫、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限期脱贫责任制。其次,推动扶贫计划和项目权的不断下移,发挥地方政府主观能动性。中央将扶贫资金、项目、权利、任务等下放到各省,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开展反贫困工作。最后,重视发挥广大基层干部的首创精神,强化贫困村第一书记制度和驻村工作队制度,治理力量不断下沉到贫困村,建立了包括帮扶责任人、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村委等在内的稳定的脱贫队伍,打通扶贫政策和帮扶工作的最后一公里^[17],为实现贫困治理提供了组织保障。

2. 巩固帮扶群众的主体地位。一是注重引导贫困人口增强自我发展能力,通过开展移风易俗、抵制陈规陋习、树立脱贫典型模范等活动增强拔掉穷根的信心,并组织参与产业扶贫、金融扶贫、电商扶贫、消费扶贫、异地搬迁扶贫、以工代赈等,激发主体意识,育强帮扶对象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智”“志”双扶并举,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能力。通过控辍保学、学杂费减免、营养午餐、贫困生补助、贫困大学生奖励等方式巩固升学率,切断贫困代际传递;加大对贫困人口的技能培训,培育一技之长,拓宽其收入渠道,在确保生活水平稳步提升中享有主体的尊严。

3. 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一是充分利用扶贫资源加大对贫困地区的定向扶持。中共中央通过整合资源,实行结对帮扶推动西部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形成东西协作对口支援、定点扶贫、山海协作、军队帮扶等模式。二是大力宣传,完善激励机制,鼓励以“强势”社会组织、大型企业为主体,广泛参与的定点扶贫等,使社会资源能够更精准地与扶贫开发对接,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调动民主党派等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工作,使涓涓细流汇聚成与贫困作斗争的磅

礴力量。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创新中国化的扶贫方式

在反贫困实践探索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同中国基本国情相结合,抓住主要矛盾,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成就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中国化成果。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业待兴的社会状况,毛泽东同志从制度层面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的原因,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消除贫困的坚定领导力量^[18],全体中国人民,尤其农民群众,是反贫困的主导力量,社会主义制度是消除贫困的最大优势和最强保障。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并提出了消灭贫困的“三步走”步骤;江泽民同志第一次将“人的全面发展”明确纳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中,明确了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19]。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扶贫开发系列重要论述,要求对贫困人口实施精细化管理、对扶贫资源实施精确化配置、对贫困农户实施精准化扶持^[20]。

2. 创新完善解决绝对贫困的理念与方式。无论是毛泽东同志早年“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强调“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等重要思想,还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求“先富带后富”等重要论断,江泽民同志“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做好扶贫开发工作”^[21]和胡锦涛同志“扶贫开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历史任务,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22]等系列重要论述,为创新解决贫困指明了方向。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在提

高脱贫攻坚成效”“扶贫开发成败系于精准,要找准‘穷根’、明确靶向,量身定做、对症下药,真正扶到点上、扶到根上”等扶贫观,瞄准的是真问题,要求的是实办法,拿出的是准方案,为全国各地创新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

3. 应对多维贫困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首位,探索多维贫困标准。如 2010 年后我国的贫困标准在以往单一收入标准之上增加了消费因素,并用逐年物价水平更新调整。2013 年以来,我国许多地方成功实施了多维贫困标准,尤其是 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将“两不愁、三保障”作为脱贫标准。201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要求贫困人口以户为单位退出,退出标准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2300 元(2010 年不变价)且满足农村人口脱贫目标(“两不愁、三保障”)。这一新的标准除考虑经济指标、物价指标外,还注重教育、医疗、住房等权利指标,多维度关注了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质量,为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坚持开放共享扶贫战略,注重减贫的国际合作交流

与贫困作斗争不可单打独斗,需要国内国际形成“一盘棋”,这样才能实现人类的减贫目标,构建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在扶贫开发过程中,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注重吸收国外减贫经验,将国外经验本土化,催生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减贫模式。如针对扶贫信贷资金还款难、到户率低等问题,积极学习借鉴孟加拉国的小额信贷扶贫模式,并将该模式中国化,最终催生了适合贫困地区实际情况的中国式小额信贷“仪陇模式”,并在全国试点推广。此外,还广泛借用国外先进的贫困监测方法、贫困分析方法,反贫困项目管理中关于项目招标、采购、报帐做法等。另一方面,注重反贫困的国际交流,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将本国经验与模式分享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共享文明成果、共同消除贫困。自 1995 年始,以国务院扶贫办与世界银行的合作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国际扶贫合作,合作范围之广,援

助程度之深^[23]。中国共产党与国际社会在反贫困事业领域的合作实现了互学互鉴,既有利于学习世界各国的扶贫经验,完善本国扶贫开发模式,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了可供借鉴的中国经验,深化合作领域,助推世界反贫困事业的发展。

三、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当代价值:贡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

消除贫困既是人类的共同使命,也是“结束全球贫困、为所有人构建尊严生活且不让一个人被落下”的具体行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贫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使 7 亿多人摆脱了贫困,而且提前 10 年完成了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减贫目标,为加快推进全球贫困治理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扶贫开发所形成的经验是人类文明财富中的瑰宝,无疑具有重要的世界价值。

(一)反贫困取得的伟大成就直接推动了世界减贫进程

截至 2020 年 11 月,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减贫规模和减贫速度令人赞叹,直接推动了世界减贫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反贫困取得的成就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一是从减贫数量来看,中国减贫人口占世界减贫人口的比重最高。据统计,1981—2012 年全球贫困人口共减少 11 亿人,中国就减少了 7.9 亿人,占比高达 70% 以上;按照每人每天 1.9 美元的国际极端贫困标准,1981—2013 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 8.5 亿人,占全球减贫总规模的 69.3%^[2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使 7 亿多人口摆脱贫困,累计脱贫人口接近欧洲总人口数。二是中国的减贫贡献推动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1990—2014 年,我国使用改良的饮用水源人口比例增加了 4 个多百分点,占全球新增饮用水源人口的比例高达 45.6%;中国减贫的推进使全球人口平均寿命提高了 1 岁。同时,按 2300 元不变价,中国每增加 1 万美元平均可减少贫困人口 4.8 人,其他发展中国家仅减少 1.5 人^[25]。

2. 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实践创新推动了世界反贫困理论的发展。纵观世界反贫困理论,主要

有西方反贫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两大体系。西方反贫困思想体系认为贫困问题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问题,而是贫困人口自身的问题,涓滴理论认为贫困问题会随经济发展自动解决。但现实是世界反贫困进入“停滞不前”困境,有的国家甚至落入“贫困陷阱”中。显然,仅用经济学理论很难解释贫困问题,因为贫困并非都是经济上的落后,还包括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发展机会等复杂性质。而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认为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26],只有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消灭剥削。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毛泽东同志等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制度层面展开反贫困的理论和实践探索;邓小平同志认识到贫穷的原因是生产力落后,主张大力发展生产力,提倡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江泽民同志强调反贫困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胡锦涛同志主张用科学发展应对贫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包括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脱贫攻坚等在内的系列重要论述和战略部署,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既为国际社会开展反贫困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资源,也有力推动了世界反贫困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二)反贫困的实践经验对世界减贫事业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中国反贫困“史无前例的成功”,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和正确决策有着直接关系^[27],形成的“中国经验”具备很强的国际“溢出”价值^[28]。

1. 反贫困的理论探索为发展中国家贡献智慧火花。在长期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的扶贫开发思想不断丰富,不断深化,经历了由强调救济扶贫到扶贫开发、由强调经济增长到注重统筹发展、由强调政府主导到注重群众参与等理念的转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扶贫开发实践不断推进,取得摆脱贫困的伟大成就。尽管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与我国大不相同,但反贫困进程中所积累的宝贵扶贫理论,如共同富裕理论、开发式扶贫理论、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结合理论等,都具有很强

的普适价值,无疑能够从宏观上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理论指导,提供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方案。

2. 反贫困的模式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实践导向。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大量的反贫困实践探索,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扶贫模式,如通过建立贫困群众与产业经营主体的利益联结,提升其发展能力的产业扶贫模式;通过对贫困群众进行培训、鼓励外出就业,以实现增收的转移就业扶贫模式;通过提高贫困群众人力资本水平的教育扶贫模式;通过改善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防止因病致贫的健康扶贫模式;通过改善贫困地区交通、水电、信息网络等状况,以提高贫困地区发展水平的基础设施建设扶贫模式;通过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形成生态扶贫模式等。这些模式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具有一般性、普适性、可重复性特征,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国情开展反贫困提供路径选择导向。

3. 反贫困的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推进贫困治理提供价值引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贫困实践经验具体包括:立足国情、因地制宜、开拓创新反贫困实践之路;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立体格局和主体多元的扶贫开发体系;始终保持并重视经济发展,处理好“经济增长与反贫困的关系”;通过产业扶贫、电商扶贫、金融扶贫等方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构建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多层面利益联结机制;注重贫困地区主动性、积极性,处理好“反物质贫困与反精神贫困的关系”;坚持“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对症下药、精准滴灌,注重策略实施的特殊性和靶向性;实现开发式扶贫与保障式扶贫相结合的减贫模式;建立返贫监测机制,对脱贫不稳定的农户提前采取帮扶性措施;对脱贫人口继续实行脱贫不脱政策,除了扶上马还要送一程。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积累的这些经验,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清晰可信的价值引领,有助于促进全球减贫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三)反贫困的实践经验有力推动全球减贫合作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党,

具备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国际主义精神^[29],在发展历程中时刻牢记和践行为人类解放和为世界做贡献的责任与担当,推动世界各国展开反贫困合作。

1. 为世界各国合作反贫困贡献“中国方案”。“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尽管我国百废待兴,但毛泽东同志依然关心世界人民,指出“我们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像别的国家一样,为世界作出贡献”。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指出不但要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还要为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30]。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世界各国人民要团结起来,多一份平和,多一份合作,少一些对抗,化干戈为玉帛,从共同利益出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早在 2004 年,我国就成立了旨在为世界反贫困事业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的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之后又建立了中非合作论坛、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和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等组织和机构,中国共产党欢迎世界各国搭上中国反贫困的“快车”“便车”,与中国分享减贫经验。

2. 为世界各国合作反贫困提供路径选择。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下贫困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自解决减贫问题,世界各国应通力合作。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国情、正视现实,抓住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大规模消除了贫困,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创新成果,具有科学性、创新性和先进性,为与其他国家合作反贫困提供理论支撑和价值导向^[31],反贫困国际合作也从传统工业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向商业零售、金融、通信和旅游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拓展,推动由“单边合作”到“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相结合的更高层次和更广领域,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经验、智慧和方案已协助多个发展中国家实施了千年发展目标,反贫困的中国方案也为其他国家学习、借鉴贫困治理经验提供了科学选择和依据。

3. 有助于推动世界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贫困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关乎生活质量、政治权利、发展机会等,中国共产党在反贫困历程中遵循“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人权”,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32]。2016 年颁布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明确提出贫困人口脱贫的指标除了收入以外还包括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全方位保障贫困人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对于缺乏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中共中央制定和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五保户”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教育扶贫、医疗扶贫、健康扶贫、住房改造等更精准的方式帮助贫困人口实现发展的权利,增强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凡此种种,中国创造的世界人权发展新奇迹,为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减贫保障人权提供了诸多成功经验。

四、结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时代,结合实际,创新务实,创下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减贫奇迹,最终取得告别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在实践探索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叙事体系,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回首历史,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实践探索取得伟大成就的经验在于,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放在首位;坚持党的领导,立足国情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坚持构建政府主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格局;坚持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基本原理,创新中国化的扶贫方式;坚持开放共享扶贫战略,注重减贫的国际合作交流。毋庸置疑,反贫困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共同使命和责任担当,中国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减贫目标,不仅为推进全球贫困治理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还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对推动世界各国团结一致合作反贫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具有重要的世界价值,是人类文明财富中永远值得珍惜的瑰宝。

参考文献:

- [1] 郑丽簪.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反贫困战略思想比较[J]. 江西社会科学, 2004(8): 159-163.
- [2] 张瑞敏, 张晓婵.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反贫困路径选择探析[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34(5): 86-90.
- [3] 陈扬勇. 毛泽东与我们党在民族复兴征程中做的三件大事[C]//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 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 毛泽东与中国道路——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 2013: 13.
- [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5: 1-3.
- [5] 叶启绩. 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比较研究[J]. 广东社会科学, 2000(6): 77-81.
-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N]. 山西政报, 1954-01-21(2).
- [7] 关于向全军印发《农业大有希望》报告的批语(1958年6月22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7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280.
- [8] 汪三贵, 曾小溪. 从区域扶贫开发到精准扶贫——改革开放40年中国扶贫政策的演进及脱贫攻坚的难点和对策[J]. 农业经济问题, 2018(8): 40-50.
- [9] 张琦, 冯丹萌. 我国减贫实践探索及其理论创新: 1978—2016年[J]. 改革, 2016(4): 27-42.
- [10] 史志乐. 1978—2015中国扶贫演进历程评述[J]. 中国市场, 2016(24): 35-36, 59.
- [11] 张琦, 冯丹萌. 我国减贫实践探索及其理论创新: 1978—2016年[J]. 改革, 2016(4): 27-42.
- [12] 黄承伟, 覃志敏. 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体系演进与精准扶贫[J]. 开发研究, 2015(2): 56-59.
- [13] 宋洪远. 大国根基: 中国农村改革40年[M].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8: 382.
- [14]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60-375.
- [15] 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 求是, 2002(22): 3-19.
- [16] 左停, 徐卫周.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反贫困的经验与启示[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0(3): 92-99.
- [17] 吴国宝.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成就及经验[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8(6): 17-30, 157-158.
- [18] 黄承伟, 刘欣. 新中国扶贫思想的形成与发展[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6(3): 63-68.
- [19] 华正学. 胡锦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新贡献[J].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12(3): 76-79.
- [20] 张永军, 张静. 精准扶贫助推老区人民脱贫致富[J]. 西部大开发, 2015(4): 35-49.
- [21] 江泽民. 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动员起来 夺取八七扶贫攻坚决战阶段的胜利——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1999-07-21(1).
- [22] 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关论述[J]. 党建, 2005(Z1): 5-10.
- [23] 人民网. 背景资料: 中国在联合国事务中的突出贡献[EB/OL]. (2017-10-11).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929/c157278-27644490.html>.
- [24] 周成洋.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奔向全面小康社会[EB/OL]. (2018-03-06). http://politics.gmw.cn/2018-03/05/content_27894036.htm.
-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国减贫对世界作出巨大贡献 30年减贫人口占全球逾七成[EB/OL]. (2016-12-28) http://www.gov.cn/shuju/2016-12/28/content_5153660.htm.
- [26] 杜丽娜. 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及当代启示[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8(8): 31-40, 159.
- [27] 唐任伍. 脱贫攻坚: 中国方案、中国经验和中国贡献[J]. 人民论坛, 2020(2): 16-18.
- [28] 陆汉文, 杨永伟. 发展视角下的个体主体性和组织主体性: 精准脱贫的重要议题[J]. 学习与探索, 2017(3): 32-39.
- [29] 付高生. 中国共产党初心的思想意蕴与理论价值[J].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23(2): 33-39.
- [30] 邓小平.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70.
- [31] 王琳, 唐子茜.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理论新发展与经验总结[J]. 经济问题探索, 2017(12): 181-185.
-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EB/OL]. (2016-10-17). http://www.gov.cn/zhengce/2016-10/17/content_5120140.htm#1.

(本文责编: 王延芳)